

危急时刻彰显凝聚力

——在尼日利亚经历政变记事

郭震远

尼日利亚在非洲乃至世界都是有影响力的国家。中尼两国1971年建交后,两国关系长期保持友好合作,发展平稳。90年代以后,两国的关系更加密切,中国对尼日利亚的双边援助始于2002年。为了促进尼日利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两国间的友好合作,中国向尼日利亚政府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,主要用于向尼日利亚提供抗疟药品、防虫蚊帐、抗禽流感物资,为尼方培训人员,为尼贫困地区打井供水。中国对尼日利亚的援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,受到了尼政府和人民的普遍好评。

1971年2月,尼日利亚同中国建交伊始,尼日利亚总统就来华访问,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盛情接待,影响广泛而深远,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快速升温,经贸关系和民间往来日趋繁荣。中国驻尼大使馆相应的办公机构较全,除使馆本部外,设有经参处、商务处、武官处、文化处及文化中心等。新建馆舍是当地的地标性建筑物。使馆原先分散在各地的处室聚集在一所大院内办公,几十个人朝夕相处,各负其

责。大家认真对待工作任务,期待着对外活动的新成果,期盼着自己能有新的收获。生活中大家其乐融融,像个大家庭。

1982至1986年我赴驻尼日利亚大使馆经济参赞处工作,初任二等秘书,后任一等秘书。当时,我国与尼日利亚的经贸往来主要以贸易和互利合作为主,很少有经援项目。但是,我国真诚平等、互利合作的原则促进和巩固了中尼关系的发展。

我到任后的一年半时间里,对外活动是同新选总统沙加里文官政府的有关部门合作。在双方共同努力下,双边互利合作项目发展到十多个,中国常驻当地项目的技术人员近百名。这些互利合作项目涉及农业、水利、小工业等产业,以及承包工程、合资经营、技术服务等多种领域。与在当地运营的其他跨国公司相比,中国企业人生地疏、规模较小,但是它们秉承合作共赢的工作原则,经营领域符合中尼彼此间的实际情况,因此富有生命力。当时的尼日利亚处于新兴的发展阶段,当地市场潜力大,但宏观调控较差。城市表面繁荣,

但贫富差距大。尼日利亚法律法规不健全,有法不依、办事拖拉,社会秩序比较混乱,偷窃、诈骗、绑票、武装抢劫等事件时有所闻。我们时刻保持警惕,既大胆开展工作,又随时准备应变,通过多种工作活动,静观局势变化。当然,我们关注最多的还是中尼的经济合作事业。

我在尼日利亚工作期间,经历过两次军事政变:一次是1983年12月31日军人推翻了文职政府;另一次是在1985年8月,另一拨军人夺取了前一拨军人的领导权。政坛动荡、军人厮杀、社会混乱,尼日利亚国内形势非常紧张,我们在工作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。

1983年12月,李柏芳经济参赞带领我们赴外埠参观检查合作项目,返回首都又召集常驻拉各斯的项目组长开会,汇总一年来的实际工作进展,总结交流经验,探求新的切入点。同时提醒大家关注当地局势,重视安全,防患于未然。要求尽量安排好生活,群策群力,迎接新的一年,开创新局面。

1983年12月31日星期六,

对我们来说这是个特殊的日子。当日凌晨,尼日利亚发生了军事政变,发动政变的军官在广播电台宣布:沙加里政府已被推翻,从现在起由军人执政……废除宪法,首都宵禁戒严,封锁通讯,劝市民不要上街外出。

意料之中、情理之外的事件还是发生了。雷阳大使立即召集全体外交官召开紧急会议,布置防范工作,明确具体任务,强调各司其职,马上分头行动。

经参处与其他处室一样,井然有序地处理日常事务,工作重点是防范趁火打劫。但是,散居在首都各地的项目小组却面临不同的境遇,他们的居所设施简陋,位置偏僻,成员稀少,缺乏应变经验。在此特殊时刻,经参处的同志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项目组孤立无援。李柏芳参赞首先提出由他亲自外出探望。我尊重李参赞的人品和意愿,坚持请他坐镇指挥,顾全大局。我主动请缨代表他外出慰问。李东柱同志积极报名愿与我结伴,代我开车。当时馆内的气氛比较紧张,而馆外周边的环境却一片静寂。我们两人出门上路时,同志们齐刷刷站立在院内,无声且严肃地挥手送行,真有点依依惜别的悲壮感觉。

我西装革履,怀揣红皮外交护照,坐进东柱同志驾驶的挂着使馆牌照的汽车出发了。一路上我们时而加速,时而缓行,奔波在拉格斯市内和郊区的多条道路上。路过的枢纽岗亭都站者荷枪实弹的士兵。往日的车水马龙的景象已经荡然无存,普通车辆

踪影不见,惟一辆朝我们相反方向驶去的轿车也是挂着使馆牌照。街头路旁看不到一个行人,热闹的都市窒息似的凝固,原本是旱季的烈日也显得灰蒙蒙的,但热浪依然袭人。我们车内开足了冷气,额头上不冒汗,手心却黏糊糊的,我们十分焦急和紧张,随时准备接受政变军人的验证与盘查。幸运的是,沿途一路顺畅,未经任何查验,因此也没有遭遇麻烦事。这可能是政变军方早有指令,按照国际惯例尊重外交豁免权,也可能因为我们的汽车挂着中国大使馆的外交车牌。

第一站抵达中土公司驻地,他们因通讯线路被控无法与使馆取得联系。他们感觉事情不对头,但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常来常往的黑人伙伴也打不通电话,失去了联系。正在纳闷焦急的时候,我们赶来了,他们非常激动,眼含泪水,大家热烈拥抱,哽咽地连声说:“感谢使馆!感谢祖国!”我们几个人团团围坐,简明扼要地交流了信息,共谋应变和防范措施,包括当前和今后应当注意的事项等问题。会谈结束后,大家匆匆话别,我们又驱车赶往第二、第三直至第七个项目点,逐个亲临慰问,无一遗漏地进行布防安排。就这样从市内到郊区,再从郊区折返不同的市区街道,我们几次路经政变官兵的岗哨,均正常通过。为了找到每一处有中国人工作或居住的地點,我们从上午9点一直辗转到夜幕降临。在最后一个项目

点我们遇到的是两位中医针灸医师。返回大使馆已经是晚上8点多,拉各斯进入了宵禁时段。

平常晚间8时,同志们已经下班,吃饭后各自休息了。那天晚上恰逢新年前夕,厨师备好的新年饭菜全摆在桌面上,却无人入席。大家都在关注着我与东柱两人在外的情况,等候着我们平安归来共进晚餐。政变后所有通讯设施均被切断,我们也没有装备无线通讯设备,在外不能与馆内取得联系,报告行踪。同志们焦虑万分,有的面对窗户向外眺望,有的打开收音机捕捉信息。许多同志坐立不安,三五成群在院内徘徊。当我们的汽车抵达使馆大门,还未完全下车时,大伙儿立刻便拥了上来,有的紧握我们的双手,有的与我们热烈拥抱,低音热语,感人肺腑,那幕亲切动人的场景终生难忘。

中国对外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,外交人员和外派的专家技术人员是促进友谊的使者。大使馆上下同心协力,终于平安渡过了这次政变带来的危机,而且各项目小组也都安全无恙。有了这一次应对政变的经历,当地1985年8月27日发生第二次政变时,我们完全能够沉着冷静地应对了。事实上,不论是尼日利亚的民众还是官方,无论是文职政府和军人执政,对中国政府和人民都是很友好的。正是两国牢固、稳定的关系为以后的经贸合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中尼两国后续的一系列友好事业如日东升、朝气蓬勃,合作共赢的道路越走越宽阔。

IEC